

# “我居”故我在

——作为文学性意义生成机制的“地方”

冯黎明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要:**“地方”作为意义的一种生成机制,跟“区域”和“本土”有着重要的差异。20世纪中期以来,在现象学的存在论影响下,人文地理学和阐释人类学将“地方”和“地方性”概念提升成为现代人文学科知识活动的重要论题。“地方性”是一个意义论概念,它在知识论和真理论范畴里的阐释有效度并不高,而在以意义论为阐释轴心的文学研究领域,地方和地方性可以发挥重要的释义作用。“地方”是一个介于“情境”和“空间”之间的概念,它兼有情境的个别性和空间的普遍性。“地方性”指向文学文本意义生成机制的阐述,其要旨在于从主体与其居所的交互关系的历史中辨析文本意义的生成。地方性是文学文本意义独特性的来源之一,而学术界常常把地方性当作文学对于区域文化精神的知识性书写,这种理解遮蔽了文学意义的个人独特性,也误解了文学的地方性特质。

**关键词:**地方;地方性;人文地理学;意义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25)03-0052-11

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孕育了第一代现代主体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索绪尔等则以“我说故我在”的语言本体论塑造了第二代现代主体。时至今日,作为世界之观察者的“我思”和作为世界之叙述者的“我说”,似乎都难以解释现代社会的高密集度自由协作模式中的存在者之存在性。自海德格尔起,学人们开始关注人的“处所”“筑居”“位置”等问题,于是一种以“我居故我在”的地方性生存意义论出现并蔓延于思想文化空间。与理性主体的“我思”以及语言主体的“我说”相比较,“我居”这一比喻性说法则表现为主体的在地

性和位置性,表现为“居住于某某地方”的意义生成功能。“我居故我在”意味着将人置于处境之中的维度上加以存在论的解释,借助于现象学、人文地理学、阐释人类学的努力,“地方性”概念在20世纪中期以来逐渐由一个地理学的术语扩展成为一个文化研究的范畴。

## 一、“地方”生长的地方——“地方”概念简史

“地方”(place)和“地方性”(placeness)在日常语言中指的是一种跟大区域或者国家相对应的地理空间位置,比如我们常说的“地方

---

**作者简介:**冯黎明,湖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从事现代审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3ZD185)

政策”“地方文化”等,但是这些术语都不同于现代人文学科知识探讨的“地方性”,因为它们关涉的论题是所谓“区域”(regional)的问题。即使是近些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层出不穷的所谓“地方性文学”或者“文学的地方性”等论说,同样也属于“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范畴,其知识学指向是跟“大文化区域”相比较而存在的“小文化区域”。比如2014年《诗歌月刊》领头发起的“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开办不久就有学者指出其口号中的“地方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性”意义的显现,而只是一种跟国家或者世界相对应的“地域性”表达。<sup>[1]</sup>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中,“地方性”概念基本上都是用以指涉“区域”而非现象学意义上所谓存在的“居所”(live emplacement)或者“处境”(situation)的特性。

“地方”和“地方性”进入人文学术领域并被建构成为一个意义论或者知识论的概念,起始于现象学的生存哲学而定型于人文地理学,后来又演变成文化研究的论题和范畴。

### (一)作为现象学生存论概念的“地方”

段义孚先生的《恋地情结:对环境的感知、态度与价值》<sup>[2]</sup>一书引入加斯东·巴什拉的书写,用“恋地情结”(topophilia)一词描述人类生存的意义感跟“地方”的密切关联。段义孚的论说明显地可以归结为现代人文主义的一种“现代性批判”的表达,因为“恋地情结”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乃是现代生存的“失根”(uprooting)或者“无根”(rootlessness)状态,与关于所谓“现代乡愁”的反省应属同一思路,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致力于解决的根本问题。

《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第二章中,海德格尔用四个单词造了一个术语:In-der-Welt-sein,其含义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他解释,“‘在之中’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它是一种生存论性质”……“‘之中’[in]源自innan-,居住,habitare,逗留。‘an[于]’意味着: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它具有colo的如下含

义:habito[我居住]和diligio[我照料]”。<sup>[3]</sup>这一论述形成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跟以往的生存论思想的重要差异,那就是:海德格尔走出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绝对性”主体,将主体(此在)之存在性置于“回归大地”的维度上思考。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中,海德格尔又用“Ereignis”<sup>①</sup>来表达此种意思,这个词进一步消除了“存在”概念的形而上学气息,而且强化了“此在之在”的“在地”性质。<sup>[4]</sup>在《林中路》中,作为彰显“物之物性”的艺术作品同样也是这种“本真”的敞开,因为这种敞开使得“真理”自动地置入作品。<sup>[5]</sup>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由此意识到地方与人自身存在的本体论关系:海德格尔“认为‘地方’将人放置在了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当中,既揭示了人自身存在的外部关系,又揭示出他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和现实的深度”<sup>[6]1-2</sup>。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生存论哲学力图用“回到大地”来抵抗虚无主义对现代生活世界的祛魅,这一学理指向应和了现代性批判的思想诉求。现象学生存论哲学的“返乡”之思自然引发了学人们关于人类生存的“处所”“情境”“事件”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又必然地引导出关于生存与其所在的“地方”之关系的思考,因为“地方”乃是个人生存最为具体也最为稳定的“生活世界”。段义孚在《地理学、现象学与人之本性研究》中就认为,人文地理学跟现象学一样研究“在世界之中的人”<sup>[7]</sup>;爱德华·凯西说:“后现代思想家中,只有海德格尔将地方主题化了。”<sup>[8]</sup>国内学者对此亦有共识,比如2014年《人文地理》杂志发表的一组关于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论文,几位作者都认为现象学哲学应当是人文地理学阐释“地方性”的思想资源。<sup>②</sup>但是现象学所涉及的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向度,即一种把关于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从形而上学的“离地”拉回“返乡”状态的认知规划。这一认知规划意在消除“现代性之隐忧”,于是启发了人文主义地理学把“地方性”作为孕育生存意义的生活世

界的建构性要素。

## (二)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概念的“地方”

人文主义地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意味着“地方性”概念正式成为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范畴。“地方性”概念的扩展、蔓延和升级,其首要功臣当属段义孚,他在《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等著作中对于“地方”和“地方性”的阐述,完整地构成了一种由人与其地理处境之关系为入口的解释生存意义的学理范式。这一点得到了人文地理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们的共同认可,比如约翰·尼古拉斯·恩特肯、马修·库尔茨、爱德华·雷尔夫等人认为段义孚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段义孚出生于中国天津,大半生四海为家。漂泊人生的后果即是他对于“生存之根”的向往,这或许就造成了段义孚在学理上找寻作为家园的“地方”的倾向。他曾经写道:“地方是安慰,空间是自由:我们守候着二者中的一方,神往着另一方。”<sup>[9]13</sup>段义孚关于地方的阐述的核心在于他将这一概念放在“经验”之中加以论说。他写道:“经验是一个综合性的术语,指各种模式,通过这些模式,人类可以认知并构成现实的环境。这些模式包括视觉、嗅觉、触觉所具有的模式,也包括人类的象征能力所具有的模式。”<sup>[9]175</sup>段义孚并不是在知识论维度上谈论“经验”,他是从现象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概念的,即一种对情境的还原式的体验。对于段义孚来说,“地方”就是这经验的生发之处,而“空间”则是诸多地方集合而被构想出来的一种坐标系。“地方”为人类提供了直接的生命经验,“空间”则为这些经验构造着展示和活动的世界;人类在“地方”中获得了真实感而在“空间”中获得了自由感。段义孚曾经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比较过两种“地方”,即: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他在《恋地情结》中把从古代城市到现代城市的变化形容为“从宇宙到景观”的变化。在他看来,古代城市是宇宙的象征而现代城市则只是建筑物的平面铺排,所

以现代城市似乎难以构成地方经验自由展示的空间世界。段义孚是公认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 Tim Cresswell 在其编著的系统介绍地方学理论的著作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2004) 的首页就标明 For Yi-Fu Tuan。<sup>[10]</sup>

在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里,雷尔夫的《地方与无地方》关于“地方”的论说最为经典。如果说段义孚的地方论说建立了“地方学”的知识学架构,那么雷尔夫的论说则为此架构充实了辨析性的学理内涵。雷尔夫的著作问世之前,“地方”和“地方性”的概念并没得到逻辑化的定义,当然这些概念几乎是不可定义而只能是描述性的,雷尔夫似乎也并不想为“地方”制造一个清晰严格的逻辑定义。《地方与无地方》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对于“地方”和与其相关的概念的比较性描述,这些相关概念有“空间”“情境”“景观”“位置”等等。该书第三章中作者以现象学方式这样描述“地方的本质”:“地方的意义与本质,不在于它所处的位置,不在于它显而易见的功能,也不在于占据其中的共同体,甚至不在于人们世俗肤浅的经历——尽管这些东西都是地方意义普遍且重要的一些方面。相反,地方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不自觉的意向性(unself-conscious intentionality),不自觉的意向性将地方设定为人类存在的重要核心。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与这样一些地方紧密相连:出生与成长的地方,目前的居住地,有过独特搬迁经历的地方,我们也都深深地关切着这些地方。这些联系似乎构建了个人与文化的认同,也是人类安全感的来源,是我们由此出发的坐标,能让我们在世界当中找到自身的定位。”<sup>[6]72</sup>雷尔夫的描述为理解“地方”的意义生成功能开拓了一条可行的学理路径。

雷尔夫通过对加缪散文的读解分析出构成“地方”的三要素,即“静态的物质景观、人的行动和意义”;他认为这三要素共同形成了我们的地方性的意义经验。<sup>[6]78-79</sup>而对于“无地方”,即所谓“无地方的地理”(placeless geogra-

phy)的现象,雷尔夫则像段义孚一样予以否定性的评价。在他看来,一种“非本真的态度”造成了我们生活世界的“无地方”,诸如“媚俗”“技术与规划”“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大型企业”等,直接导致现代生活世界失去了地方性的意义经验。

### (三)作为知识学概念的“地方”

跟人文主义地理学相类似,阐释人类学的思想资源同样也是现象学哲学。如果说人文主义地理学从海德格尔那里汲取了复归大地的思想资源,那么阐释人类学则倾向于引用海德格尔的阐释学改造经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学界,“地方性”这一概念更多的是源自阐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在中国学界的传播。自从1999年该书中文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地方性知识”一词便在国内人文学界流行开来。

吉尔兹并未给予 local knowledge 一个准确的定义,该词在中国学界的使用有些混乱。国内学界有学者主张该词应该译作“本土知识”以区别于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性概念。<sup>[11]</sup>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观念来自他早年关于巴厘岛斗鸡游戏的实地考察活动,这次活动让吉尔兹夫妇进入到巴厘岛人群内部来理解斗鸡游戏的意义。西方传统的形式化的普遍法律是从外部对于事实进行观察和评判,这就造成了“法律和事实”的分离,因此便很难从内在的意义和价值层面上理解巴厘岛人对于斗鸡游戏的合法性认可。作为阐释人类学家的吉尔兹需要的是从人类学意义上解释这场文化实践,所以他提出应该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去理解这场被普遍性的法律条文所禁止的活动。吉尔兹主张人类学家放弃那种由外在的、普遍逻辑视角展开的观察方式,以所谓“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即由巴厘岛人的内在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斗鸡游戏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吉尔兹写道:“我一直在说,法律,与英国上院议长修辞中那

种密码式的矫饰有所歧异,乃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这种地方性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我一向称之为法律意识者正是这种特性与想象的结合以及就事件讲述的故事,而这些事件是将原则形象化的。”<sup>[12]</sup> 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主张文化阐释者的认知和判断应该放弃西方传统的由形式化的普遍规定性出发的“外部观察”,这种以所谓客观性为合法化依据的观察理解方式并不能解释对象自身内部的结构、意义和功能。由此观之,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意在推行一种“由外而内”的阐释视角,将其汉译作“本土知识”亦无可——甚至更为贴切本义。

2004年科学哲学家劳斯的《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sup>[13]</sup> 汉译出版,此书第四章从“知识权力”的角度讨论了“地方性知识”问题。劳斯的“地方性知识”跟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劳斯的地方性知识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学理依据,意图论述在实验室这样一个“情境化”的地方生产出来的知识如何被“转译”并提升为“对于普遍规律的概括”从而获得了权力地位。吉尔兹和劳斯两人关于“地方性知识”的不同论述,在国内 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领域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吉尔兹和劳斯两人的地方性知识属于同一种知识类型的不同表达,还是两人的地方性知识分属于不同的类型?<sup>③</sup> 不过,在中国学界影响较大的还是吉尔兹的阐释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文学批评界经常引以为讨论地方文学特性——诸如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文学的地方性之类的论述——的知识学依据的多半是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

跟人文地理学追随现象学“回归大地”的学理动机一样,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地方性知识和阐释人类学领域中的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很显明的现代性批判的倾向。无论是吉尔兹

对于形式化的普遍法律的解构还是劳斯对于科学知识的总体性权力的解构,都离不开以“地方性”对抗“全球性”的后学立场。

## 二、“地方”:在“情境”与“空间”之间

“地方”和“地方性”作为人文学科知识范畴形成了一种新的阐释模型,这一模型势必将相关学科的相关论说纳入其学理构架以完善其知识系统。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跟“地方”有关的概念序列,比如空间(space)、情境(situations)、位置(location)、景观(spectacle)以及事件(event)等。从地方概念本身的形成来看,空间和情境这两个概念跟地方的关联度最高,我们甚至可以说,地方是一个介于情境和空间之间的概念。位置、景观、事件等合成了情境,情境的持续性和同一性的呈现造就了地方,地方的结构化和普遍化则形成了空间。情境、地方和空间这三个概念都体现了现象学之后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指向即回归生活世界,或者说回归所谓“本真之地”(authentic place)。从情境到地方再到空间,形成了一个生活世界逐渐由居所到全球、由具象的物性大地到抽象的形式世界、由在地的变动不居到超然的同一性宇宙的序列。在这个序列上,居于情境和空间之间的地方之所以在意义的生成方面独具功能,就是因为它一方面保持着情境的生命质感,另一方面又蕴含着空间的形上之思;或者说它一方面超越了情境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空间的虚无化。地方让我们在情境之中见识了宇宙,同时又在空间之中感受到自我——这大概就是地方之意义建构功能的特质所在。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体制将全部社会实践“景观化”,以物化的景观主导并规训个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社会关系;这种普遍的异化状态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失去了真实感,用德波的名言来说就是“所有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仅仅成了表征”。德波写道:“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

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都化为一个表象。”<sup>[14]</sup>于是他提出一种“情境主义”(situationist)来为景观社会祛蔽,情境主义的要旨在于从符号性的景观回到本真性的情境。1957年,德波创立了一个艺术组织——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率领一帮艺术家实践他的情境主义艺术理想——为个体生命重建一种非秩序化的、偶然性的活动情境。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sup>[15]</sup>也是在1957年出版,此书提出一种理解历史的“情境逻辑”,反对总体性的历史决定论对历史事件的宿命式解析。其实早在德波提出情境主义艺术、波普尔论述历史的情境逻辑之前,海德格尔已经把存在之本真置于“居所”(lived emplacement)之中,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第四卷第一章中也讨论过“人的情境性”与自由的关系。<sup>[16]</sup>

现代性批判理论大都认为主体性形而上学对于生活世界的祛魅乃现代病之源,因此生命的情境敞开状态就被视为回归存在之本体性质的唯一途径。波普尔的“情境逻辑”意在反抗总体性的历史理性对于“事件历史”的规训,而贡布里希说道:“西方艺术的故事就是无休无止的实验的故事,就是追求前所未有的新颖性和独创性效果的故事。”<sup>[17]</sup>对于贡布里希来说,真正影响了艺术创作的是艺术家所处的具体语境,比如像我们所说的构成了情境的位置、景观、事件等,而不是那些宏大的“时代精神”“艺术意志”。“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情境论诗学观念的表达,因为此一说法将诗的涵义置于“登山”或者“观海”这样的情境体验活动之中,用主体在特定情境中的活动解释诗意或者诗情的生成。但是这并不能在情境和地方之间画等号,情境这种具象性和变动性的“处境”只能提供一种“位置感”或者“物感”,而这些非持续性的意义感还不能构成我们的“地方”——地方的构成还需要一种带有“守护神”意味的“场所精神”(genius loic)。只

有相似的情境持续性地出现在我们的经验之中,“地方”才会成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比如在苏轼的生活世界中,有些城市成为了“地方”(比如黄州、惠州、儋州),而有些城市只构成了“情境”(比如密州)。<sup>[6]</sup>情境主义国际意图把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的无意识行为转化成为日常生活的情境,这种有悖人类的社会性本质的做法很可能导致反社会行为泛滥的后果,因为此种情境一方面固然解放了被技术化社会和中产道德压抑着的本真生命意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释放出违逆一般社会规范的“丛林性”原始生命冲动。情境或许是构成我们生活世界的源始性要素,回到本真的存在首先意味着回到情境,但是从意义生成的维度看,情境只有升级至地方才能具有生产普遍可传达的意义的功能。

相比地方与情境的关系,地方与空间的关系更加引人关切。关于地方与空间的关系问题,段义孚在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1977) 一书中做过专门的论述,后来雷尔夫的《地方与无地方》对此问题的辨析可能是最为细致深入的。在雷尔夫看来,人类婴儿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原始的空间”感,成长使我们获得了“知觉的空间”。原始的空间和知觉的空间是地方形成的基础,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地方的形成,有赖于主体在情境之中的经验,按照雷尔夫的说法就是建构成一种“存在性的空间”(existential space)。“通过特定的际遇和经历,知觉的空间可以演化为丰富的、具有差异性的地方,或者成为个人性的特殊中心场所。”<sup>[6]</sup>存在性的空间包括地理空间和神圣空间,它们形成了个人经验中的意义。“因此,存在性的空间里的地方可以被理解为意义的中心、意图与目的的焦点。而由意义与功能所界定出来的地方,其形态对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来说都不一定是相同的;而且,这些中心不一定都能通过自身的物质特征清晰地界定出来。然而,这些中心必须具有能被人们体验到的且与外部环境不同的内部特

质。”<sup>[6]</sup>“‘存在性的空间’将人类的‘空间经验’与‘生活世界的空间’(spaces of lived-world)的再造过程结合在了一起。”<sup>[6]</sup>存在性空间之上,更具主体性也更为形式化的是“建筑空间与规划空间”,这些空间形式体现了人类用技术建造空间的实验,此类空间营造活动为我们带来了城市这种最具意义生发功能的“地方”。影响我们的“地方”的还有“认知的空间”和“抽象的空间”,这些空间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形成地方的观念条件。在雷尔夫那里,诸空间形式对于地方的形成都有所影响,但是空间本身不等于地方,地方主要发生在“存在性的空间”。相比于段义孚关于空间跟地方的差异性的思考,雷尔夫似乎更重视空间和地方的联系。大多数空间理论在空间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是:地方是构成空间的要素而非像人文主义地理学认定的那样空间是地方的构成要素。人文主义地理学更看重地方的意义建构功能,比如在段义孚的眼中,空间中人类会有趋向自由的感觉但是意义感却持续递减。人类的空间意识有着远比地方意识更为理性的内涵和构成,现代空间意识往往是地方感被“几何学理性主义”处理之后的产物,比如我们对于长期居住的城市的“地方感”和我们对于该城市的空间意识,前者是一种具象性的体验而后者则呈现为一种坐标系性质的想象图示。正如 Tim Cresswell 所言:“Space is a more abstract concept than place.”<sup>[10]</sup> (“空间”是一个比“地方”更抽象的概念)如果说同一性的情境聚合、积淀形成了地方,那么空间则是地方的差异性组合的结果;地方为情境置入普遍性和主体性,又为空间填充景观和事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讨论现代性的“脱域”(disembedding)现象时写道:“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sup>[18]</sup>因此我们也可以作如此理解:由情境而地方继而空间,三者之间次第呈现出一种“脱域”的关系。

“情境”“地方”和“空间”这三个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知识活动的重要角色,是因为所谓“处所”(situation)或者“位置”(location)构造了晚期现代性世界中的生存特性。晚期现代性的生活世界是一个高密集度的、超级链接和自由协作的社会空间,这个结构化的社会系统让每一个人都处于多维坐标系中的某一“相位”之上,当代生活世界里的存在者是由这“相位”获得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我们可以这样说,笛卡尔时代人类设想了一个先验性的理性主体,即以我思故我在为生存本体论的认知主体;到维特根斯坦时代,语言哲学家们为人类设计了一个语言论的生存本体,于是我思故我在经过语言论转向变成了“我说故我在”。当人类步入晚期现代性的生活世界,坐标系状态的生活使得“居所”或者“驻地”成为我们生存的规定性力量,因此一个当代论题——“我居故我在”——便浮现了出来。人文地理学、阐释人类学以及情境主义艺术等人都把人的处境视作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之源头,这是在直面当代生存的根本问题并设想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情境、地方、空间等概念的核心内涵恰恰就是我们在“居所”或者“驻地”之中生成的意义经验。

在“情境”“地方”“空间”三个概念中,情境是最为具体的同时又是最缺乏稳定性的,而空间则是最为抽象且最稳定的,地方应该属于那种既有在地性又有想象性的一种居所。主体长时间沉浸于某种情境并经历各种体验之后逐渐积淀而成其为地方,主体对地方的想象和理解形成了空间。地方将具象化的情境与抽象化的空间结合为一个有意义的地理意象,将主体的生命体验与物质世界的空间结构图绘为一个价值化的生存境界。如此理解下,人文地理学视域中的“地方”跟阐释人类学视域中的“地方”之间的差异就显露无疑了。准确地说来,阐释人类学使用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确应该译作“本土知识”——无论这个“本土”是吉尔兹描述的巴厘岛少数族

群聚居地还是劳斯描述的科学实验室。人文学科意义上的“地方性”强调的并非“地方—全球”或者“地方—国家”的对应关系,而是强调“个人—环境”的交往关系。阐释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很容易让人去关注中心与边缘或者总体与他者的关系,所以吉尔兹的著作传入中国学界后引出了诸多举着“地方性”旗号的“区域研究”。比如诸多名之曰“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某某地区文学”的论说,大都没有准确理解段义孚先生的学理诉求——段先生以 place-ness 而非 locality 表述地方性概念,其意在于强调地方性的“我居”特点即“自我”与“居所”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同时尽力回避“区域文化”对于主体的先在或外在的决定性权力。当然美国文学界一直存在的“地方主义”术语也是按照“区域”来理解“地方”的。比如关于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争论以及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争论,其中“地方”一词指的要么是跟国家对应的行政区域,要么是跟世界对应的民族区域。其实“文学的地方性”并不生成于大区域与小区域的对应关系之中,而是生成于文学家个体与其所处之地的对应关系之中。

### 三、“地方性”:在“意义论”“文学性”和“发生学”之间

“地方性”概念作为一件知识学工具,其阐释有效性需要做如下的限定:第一,地方性概念在知识论、真理论范围里阐释功能并不明显,其主要作用范围是意义论;第二,地方性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应该大有作为,因为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即在于对文学文本意义的阐释;第三,地方性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作用主要指向关于个体性的文学现象的意义阐释,而关于群体性文学现象的地理学阐释属于“区域研究”;还有一点就是,地方性应当归类于一种发生学的研究,其主要的知识学功能在于解释个体性文学现象的意义发生机制。文学性的意义生成于作者与其居所之间的交往实践,因此

不可以把文学当成区域文化精神的解说辞。

### (一) 地方性与意义论

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理解有三种形态,即:意义、知识和真理。其中意义是我们对世界感知的开启,意义的形式化、类型化、逻辑化则形成了知识,知识的普适化、抽象化、精确化再形成了真理。地方作为主体的居所乃是生成意义的重要机制,而随着意义被“序化”为知识以至于知识被提升为真理,其中地方性逐次减弱而全球性逐次增强。比如我们在街区的行走会产生地方性的意义感,但是当我们在城市地图上查看所居住的街区的空间位置的时候我们便进入了知识活动,此时地方感弱化;进而在我们以精准的计量标记我们街区的几何数据时,地方性的意义感近于消失。这就是张爱玲小说能够让我们读出地方性(上海)的意义感,而茅盾的《子夜》却读不出地方性意义的原因所在。张爱玲是在写她居于上海的情境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意义感,茅盾却是在借上海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认知。所以我们需要给地方和地方性概念的阐释有效性设定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意义论”的阐释边界;一旦跨入知识论和真理论的阐释空间,地方和地方性概念的阐释有效性将迅速减弱甚至于失效。从段义孚先生关于城市的地方性意义的阐释看,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概念的阐释有效性范围就是“意义”。吉尔兹也认为:“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阐释科学。”<sup>[19]</sup> 吉尔兹虽然意识到文化的阐释指向“意义”,但是他关于巴厘岛人斗鸡游戏的理解却力图将地方性的意义经验展开为知识。吉尔兹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对巴厘岛人斗鸡游戏进行的“深描”,为我们提供的是对意义的想象性体验,而绝不是法律层面的知识。就此而言,吉尔兹似乎应当将自己在巴厘岛的经验解释为“本土性的意义”而不应当名之以“知识”,因为如果此种意义经验被升级为知识,则意味着全球性的增强和地方性的减弱。

人文地理学和阐释人类学传入国内学界后,关于地方与地方性问题的论说大量涌现,其中很多是套用术语于特定文化现象的解释,而缺乏对于地方和地方性概念的知识学指向和阐释限度的准确理解,因此这些论说大都没有能够体现地方性理论的真意,即从地方性的描述中辨析文化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比如吉尔兹的“local knowledge”被译作“地方性知识”,由此引发学界将“地方性”视作一个知识论范畴而非意义论范畴,进而文学研究界也以知识论处理文学文本的意义经验内涵,把作为个别主体的文学家与其“居所”间对话而生成的独异性意义,当成文学家对于其居区的区域性文化生态的知识性书写。由知识论理解地方性,其结果必然是文学文本的独异性意义让位于普遍性的“知识”,文学的地方性也必然被文学的区域性替代——须知意义的生成是文学性活动的本质而知识的表达只是文学的一种附加功能。

### (二) 地方性与文学性

文学活动以意义的生产传播消费为主轴,因此文学活动显示出极其强烈的地方性色彩,进而文学研究也必然地围绕着意义论展开。形式研究、传记研究、文学史研究等,无论何种专题性的文学研究,最终都必须归结为文学文本意义的阐释。地方和地方性同样指向意义论,所以地方性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应该有着极高程度的阐释有效性。尤其是现代性工程展开以来,全球性的普遍主义跟地方文化之间发生了冲突,于是“地方主义”就成为了对抗全球性普遍主义的文化工具。1920年约翰·杜威发表《美国主义与地方主义》<sup>[20]</sup>一文,极力推崇一种美国本土的文学以对抗所谓世界文学,并且声称“地方的是唯一普遍的”。在杜威文章影响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提出了他的地方主义诗学,希图以地方文化精神反对文学上的国家主义。中国文学界一直流传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说法,美国的地方主义则以“地方的是唯一普遍的”表达了一种对地方性意义的普遍价值的认可。美国的地



方主义文学跟后来的人文地理学关于地方性意义的论述一样,都体现了“在地性”的情境体验对于意义生成的启动功能——尽管地方主义文学还没有能够达成后来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关于地方性的理解。

与当年美国的地方主义文学一样,当代中国文学界所讨论的地方文学论题重视的是“在某地方出现”的文学,而疏于对个体性的文学文本意义生成的地方性要素及其运作方式作辨析。国内的地方文学研究热衷于对特定地域的文学进行总体性叙述,这种论说方法源自对现代人文学科的地方性理论的宗旨的误读。倒是美学界对于地方性审美经验的论述比文学界的论述更接近地方性理论的本意,比如美学界关于个人审美经验与地方性意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就值得文学研究界借鉴。<sup>[21]</sup>文学性是一种个人化、陌生化的意义经验,而地方性同样是个体性的;我们每个人的地方体验都有着相互差异的内涵。同居一城且有着相近的身份、教养的两位或者数位作家,其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地方感”可能显现出明显的差别,比如那些被称作诸如“海派”“京派”的作家群,其中每一位都有着仅仅属于自己的特别的“城市经验”——这种不可重复的经验恰恰就是地方性理论的辨析对象。文学研究的终极任务是对于文学性的阐释,而文学性是以“历史中的个体”的方式存在的,因此在文学性中间显现的地方性意义经验同样也是一种独特性的个别经验。归纳汇总某地域文学的总体特征的研究固然有其必要,但这种研究只是为辨析个体文学现象的地方性意义的差异性所做的基础工作,关于文学的地方性的研究需要完成的终极任务是对于文学文本中的独特的地方性意义经验的阐释。

“地方”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标记着我们每个人筑居之地的地理内涵,而“地方性”则应该被当作一个文化学概念,它的内涵规定性是人与其筑居地之间交互关系的历史后果即“意义”;地方性是人和地方“对话”的产物。因此每一个文学文本的地方性意义都是独一无二

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地方体验都具有独特性一样。以地方性为主题的文学研究意味着从个人与其所处的地方之间的关系中考察辨析文本意义的独特性,比如张爱玲小说的独立性的意义就需要从张爱玲这一个个跟她的居所即上海的“交往历史”中进行考察和辨析。

### (三)地方性与意义的生成

意义论研究有诸多形态,诸如语义学的意义论、意义结构理论、意义功能理论等,地方性的意义论研究的主题是意义的生成机制问题,因为地方性本身并不能被理解为意义而只能被理解为引发意义经验的要素之一。

发生学跟实证主义的“起源论”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等于起源论。发生学研究某一现象的生成过程,即这一现象从原始奇点历经扩展、变异、演化、蔓延等复杂过程直至以如此这般的形态出场的历史,亦可称作事物的谱系学历史,而起源论只是以事物最早出场的形态与现有形态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事物的属性。当我们说地方性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是在说地方性是文学文本的意义的发生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地方性设定为文学意义的发生学机制之一。很多所谓“地方文学研究”只能被归入起源论范畴,因为这些研究是在为某一文学现象设定一个所谓“地方文化”的源点,比如:先描述某一地区文化的总体风貌,然后对比某某作家之作品的涵义或风格,最后判断该作品的地方文化精神特质。此种所谓“文学的地方性”的研究是在用同一性的“源点”解释个体性的文本意义,这类研究把个人化和陌生化的文学性处理为某一总体性的“地方文化精神”之因的遗传性后果,因而真正属于作家自身的地方性意义经验相反被遮蔽了——被总体性的“起源”遮蔽了。

发生学地方性研究的学理视点聚焦于作为文学活动主体的作家个人与其所处的地理“居所”的关系。人与其居所的关系就是文学文本意义的地方性的建构机制,这一关系可以是互生性关系、互动性关系、对话性关系甚至对抗性关系,但是绝不能是决定性关系,既

不是人决定其居所也不是居所决定其人。在艺术的地方性意义生成机制的分析方面,萨特对于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艺术家丁托列托的叙述很有典范效应。萨特从经济状态、族群关系、城市景观、行业习性、人际交往等方面细致地描述丁托列托跟威尼斯这座城市的关联,他写道:“丁托列托的油画本身就是一场个人与一座城市之间的热情似火的风流韵事,在这方面,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人也是最重要的人。”<sup>[22]47</sup>“在这里,在一堵堵砖墙里边,在上空的繁星和平静的水色之间,在神灵之光消失后的火红壮丽下,永恒将在一个人的生存时间中被长久地战胜。”<sup>[22]46</sup>萨特从丁托列托的风格主义绘画中辨析出一种特别的“焦虑”心态,他解释道:“丁托列托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城市里,他吮吸了威尼斯人的焦虑,也毁灭于威尼斯人的焦虑,除了威尼斯人的焦虑,他没有可画的东西。”<sup>[22]54</sup>萨特的阐释之启发性在于:由地方性入手解释文本的意义需要介入主体与其地方的互渗关系,将其视作一场交往理性的实践,由此梳理出沉积在文本中的隐喻性的意义。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独特涵义也是这位才女跟上海这地方之间“主体间性”实践的产物,而绝非对于既有的所谓上海文化的表达。假如萨特先行设定所谓“威尼斯文化精神”然后再叙述丁托列托如何表达了这一总体性的和先有性的地方文化精神,那么他永远无法辨析出丁托列托跟委罗内塞的差异。

最后还需要辨明一个问题:地方性只是意义生成的诸多机制之一,其阐释的有效性需要有所限定。文化文本意义的生成表现为诸多要素的合力作用,地方性只是这诸要素的一种而已。即使是人文地理学,也并没有把地方性视为生成文本意义的唯一机制,而且人文地理学也承认存在着“无地方性”意义的文化文本,比如先锋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地方性的艺术。不仅不能将地方性视作文本意义唯一的决定机制,而且还必须清醒意识到:过度的地方性或许会造成令人尴尬的后果,即一种坐井观天式的狭隘视野。雷尔夫

说,“如果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深深依恋演变为一种排外的态度,将这个地方置于隔离或种族清洗的极端暴行之中,那么,家就不能算是美好的地方了”“狭隘的地方经验所构成的强烈地方感并不一直都是美好光明的,其中也有阴暗的一面”。<sup>[6]xxvi</sup>事实上国内文学界出现过很多这种自恋于“强烈的地方感”之中的文学,此类文学沉浸于乡土而失去了世界。

### 【注释】

- ① 孙周兴先生将 ereignis 译作“本有”,该词亦有“事件”或者“发生”的意思。国内学界一般认为,海德格尔最早使用该词是 1919 年的《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
- ② 这组文章为李溪:《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视野》;宋秀葵:《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研究》。
- ③ 关于吴彤教授和刘兵教授之间的这场争论,可参考曾点:《地方性知识的两套逻辑——与劳斯教授笔谈》,《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 年第 1 期。
- ④ 苏轼晚年在其《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曾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参见《苏轼全集校注第八册(卷 48)》,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第 5573 页。

### 【参考文献】

- [1] 梁平.“地方主义诗群”:一场涣散的集体暴动[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5):81-84+144.
- [2]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74.
- [3]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63.
- [4] 海德格尔.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3,30-31.
- [5] 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5-21.
- [6] 雷尔夫. 地方与无地方[M]. 刘苏,相欣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7] TUAN Y F.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 study of human nature [J]. *Géographies Canadiennes*, 1971, 15(3): 181 – 192.
- [8] CASEY E S. Getting back into place: toward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world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
- [9]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10] G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04.
- [11] 巴战龙. 地方知识的本质与构造——基于乡村社区民族志研究的阐释[J]. *西北民族研究*, 2009(1): 160 – 165.
- [12]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 阐释人类学论文集 [M]. 王海龙, 张家瑄,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273.
- [13] 劳斯. 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M]. 盛晓明, 邱慧, 孟强,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4] 德波. 景观社会 [M]. 王昭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
- [15] 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M]. 杜汝楫, 邱仁宗,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萨特. 存在与虚无 [M]. 陈宣良,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618 – 708.
- [17] 贡布里希. 艺术的故事 [M]. 范景中,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8.
- [18]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8.
- [19] 吉尔兹. 深描说: 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 [M] // 文化的阐释.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3 – 34.
- [20] DEWEY J. Americanism and Localism [J]. *The Dial*, 1920(68): 684 – 688.
- [21] 王大桥. 地方性审美经验: 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关键词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3(1): 105 – 108.
- [22] 萨特. 萨特论艺术 [M]. 欧阳友权, 冯黎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责任编辑 林雪漫]

## "I Dwell", Therefore I am: "Place" as a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Literary Meaning

FENG Li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445000, China)

**Abstract:** As a generative framework of meaning, "space"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geographical region" and "indigenouness".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influenced by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have positioned the concepts of place and placeness as central topics in modern humanities. While "place-basedness" is a concept rooted in meaning theory, its interpretive validity is limited in epistemology and truth theory. However, in literary studies, which center on meaning-making, place and place-basedness serve as critical interpretive tools. Place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situation" and "space", combin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situation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space. The exploration of meaning generation in literary texts through place-basedness focuses on distinguishing textual meaning from the histor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ir dwelling. Place-basedness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uniqueness of literary meaning, yet it is often misunderstood as a knowledge-based represen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pirit, thereby obscuring the individuality of literary meaning.

**Key words:** place; placeness; humanistic geography; theory of meaning